

# 學術期刊的社會責任

陶一桃

學術期刊不僅是思想的載體，傳播知識與價值的平臺，更應該是一個社會理性而冷靜的頭腦，體現客觀、科學、公允的良心。學術期刊的社會責任，不是她在其原本職能之外所多承擔的另一份職責，而是其自身原本就擁有的使命。這正如阿瑪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的內在邏輯一樣：自由從來就不是作為發展後的結果而存在的，其本身就構成了發展的內容。我以為，學術期刊的社會責任通過編輯者包括評價體系、技術手段在內的價值導向和偏好，作者的學術價值取向和責任感等因素共同展現出來並影響、引導、示範著社會。

首先，學術期刊應該以高貴而正直的文化力量影響社會。文化作為一種觀念的力量不能直接改變社會，但卻能改變人，而人則能改變社會。學術期刊不同於其他刊物的一個重要特質就是，她是思想者創造思想、展示思想、傳播思想、探尋真理的學術平臺。從根本上說，應該是文化的人，甚至可以說是一個社會最有文化價值感和責任感的人維繫著學術期刊的運行，決定著學術期刊的品質與道德高下。古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道出的也正是學者亦或讀書人似乎與生俱來的社會責任。有知識的人是要承擔社會責任的，這正如有思想的人必定要經歷更多的內心掙扎一樣。我們社會的知識分子應該是獨立的，而非中立的。毫無疑問，心靈的獨立是最根本的獨立。要讓知識與良知同在，學術與正義共存。所以，儘管我們可以不得不暫時承受商業社會肆無忌憚的功利，我們甚至可以不得不暫時接受浮躁文化的橫流，但是我們絕不能長久地放任學術文化的功利與浮躁。因為，當一個民族的學術和做學術的人也都在放棄對文化的高貴和高貴文化的堅守時，我們失去的不僅僅是文化與學術本身，更有社會的正義與良知。

其次，學術期刊應該以其科學、客觀、公允的學術品格引領社會。從操作層面上來說，學術期刊所應該具有的良好的學術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學術期刊的價值取向和編輯者的個人職業操守與信仰。但從根本上說，則取決於社會相關制度環境與制度安排的內在導向。有怎樣的制度安排，就會有怎樣的人的選擇行為。生活實踐告訴我們，群體的選擇行為是制度和制度環境的產物，而非簡單的個人理性和良知的結果。所以，制度的文明既決定了社會選擇的文明，又決定了社會人選擇的文明，更決定了學術期刊的道德品格。當學術期刊被附加上額外的“工具意義”的功能時，比如成為評定職稱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據，或獲取學術榮譽不可或缺的評價體系中的重要指標，並且這一切又都被我們的社會給制度化了，那麼“工具意義”制度上的強化作用和現實上的功利取向，既可能會折損學術和學術期刊的道德品質，也可能會消磨學術和學術期刊的科學的屬性、客觀的本性和公允的道德性。我們的社會的確需要更好更多的研究成果，但學術研究的真正目的不是創造數量。同理，學術論文轉引的真正意義也不在於轉引率高低本身。如果一個社會以唯 GDP 導向來評價社會發展成就與水平，那麼它無疑會帶來以更多的資源財富的消耗來創造財富的惡性循環。以學術論文的數量作為考核學者學術貢獻的“學術 GDP”做法，不僅會喪失學術所固有的嚴謹，還會使我們的社會失去學者的尊嚴和學術的崇高。

第三，學術期刊應該以學術的規範，包容的胸懷和學者的良知示範社會。學術規範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一個由道德決定的制度約束問題。但說到底，真正能夠約束人的選擇行為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制定制度並又在制度框架中生活的人。由於制度具有先天的不可完善性，所以人的投機主義行為既可以利用制度違犯制度，又可以堂而皇之地鑽制度的空子。因此對學術規範的堅守是一種心靈的自我堅守。高尚的道德是可敬而又稀缺的，而自律則是最難得的美德。但是，一個社會僅憑道德和基於道德基礎之上的自律是遠遠不夠的。當我們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一視同仁地成為法律的奴隸時，我們的社會才有可能真正走向普遍的道德自律。學者的自律源於學者特有的良知和信仰。正如尼采所說：為了樂於過你的生活，你要先置身於生活之上。要學會提高你自己，還要學會向下俯望。當我們做對了，沒有人會記得；當我們做錯了，沒有人會忘記。學者的自律就是一種為了忘卻的堅守，為了崇高的放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不同於他人的特有目標，但當一個人追求自己特有的目標時，他的行為一般應該服從並依賴於社會共識的基本價值。如果一個社會的基本價值得到堅定而一致的公認，它就會抑制有可能發生的個人機會主義行為，從而構成這個社會的制度支柱。我以為，從根本上說不是浮躁的社會鑄造浮躁的人，而是浮躁的人鑄造了浮躁的社會。有人說，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創造著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又以不同的方式創造著不同的文化。借用這個邏輯，我們可以說，有什麼樣品格的學術期刊，就有可能在相當程度上造就具有什麼樣品格的學者群體。一個好的學術期刊應該是培育、締造真正學者的堅實的大地；產生、滋養優秀思想家的自由的天空。

儘管學術期刊具有其專業屬性，但無論如何，一個國家或民族對史學研究的看重，是對現代與未來的一份責任的堅守。歷史不僅僅是人類知識中具有相當大價值的一部分，而且還會為人們打開通向許多學科領域的大門，並為人們更廣泛的研究提供有價值的素材。我們研究歷史不僅僅是要瞭解、記住過去，更重要的還在於讓歷史告訴未來。歷史是一面鏡子，也是一本深刻的教科書。作為鏡子，它照亮現實，也照亮未來；作為教科書，它給人知識與智慧，也把人類自身的那些曾經的無知與非理性告訴後人。有時我們在前行中屢犯錯誤，往往不完全是由於我們缺乏知識和智慧，而是由於我們不瞭解或忘卻了歷史。一個民族能向後看多遠，就能向前走多遠。

對研究方法的兼容並蓄，是對學術自身規律的遵守，也是學術理應具有的胸懷。研究方法上的學科借鑒，甚至交叉學科領域中研究方法上的創新性使用都是一種學術的拓展與進步。但若以某一種研究方法為時尚並排擠其他研究方法的做法，則是狹隘而又缺乏智慧的。研究方法就是方法，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達到目的的手段或途徑。這正如數學對於數學家來說其本身是內容，而對於經濟學家而言它只是工具一樣。如果一篇學術論文除去了公式和對公式的推導外，少有或沒有思想的震撼與啟迪，我們真的很難稱其為學術。有些學科在研究方法論上的“買櫝還珠”，與其說是學者的悲哀，不如說是學術和我們社會的悲哀。

我們的社會到了應該並可以“養”一批純學者和思想家的時候了。當我們的學者不再需要為了有尊嚴地生存而疲於奔命時，才有更大的可能為學術而學術地探索著；當我們的學者不再被利益驅使著而從事研究時，研究的成果才有可能會是科學、客觀、公允的；當我們的學者的研究不再附炎媚俗而短視時，理性、良知和社會責任感才會從理想變為現實；當我們的學者可以自由地為真理而吶喊時，我們的社會才會擁有更多凜凜傲骨的學者。學術期刊的社會責任就是以其自身獨特的力量，讓我們的社會擁有這樣的明天。

（作者係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主任，教授）